

深圳多名法官落马事涉破产拍卖

中纪委、监察部调查组已进驻广东，调查组表示，不铲除深圳司法界黑幕决不收兵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

2006年6至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调

查还在逐渐向基层法院渗透。这些卷入调查的法官包括已退休深圳中院法官廖昭辉、破产庭庭长张庭华、涉外庭庭长蔡晓玲、执行局二处处长李慧丽、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裴洪泉等。

据透露，深圳中院被抓的

几名法官，几乎都在裴洪泉任破产庭庭长时在破产庭工作过，案发也都是因为牵涉到破产案。深圳中院破产庭三任庭长为：裴洪泉、蔡晓玲、张庭华，如今悉数被抓。

一边是走在改革前沿的全国知名法院，一边是曝出腐败

串案的现实。深圳中院的“沦陷”无疑带给了世人深刻的反思。

据记者了解，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对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高度重视，自任院长以来，多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级法院要

切实加强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

一位知情人士称，中纪委、监察部的调查组已进驻广东，调查组领导表示，不解决、不铲除深圳司法界黑幕，决不收兵。

深圳中院20多名法官被调查

深圳中院一批院长、庭长级法官先后被逮捕、“双规”，最初是由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引起的。

事起退休法官受贿被查

据一个检察官透露，案子最早是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办的，调查从已退休的深圳中院法官廖昭辉及资深拍卖师林某开始。

廖昭辉2005年7月正式从深圳中院退休，此前在刑庭、执行庭都担任过法官。在他退休后，检察院调查表明，他在任执行庭法官期间，曾收受一拍卖公司老板林某的贿赂。

廖昭辉被逮捕后，深圳市检察院的调查矛头指向了新上任的民七庭（即破产庭）庭长张庭华。今年6月6日上午，刚刚搬到新办公室的张庭华被逮捕，随后检察官在他的汽车里搜出10万元人民币现金。有传言说，检察院当日在他的办公室搜出150余万元现金，其中120万元是港币。

中纪委最高检联手

张庭华被逮捕后，案件请示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进展加快。

随后，深圳中院民四庭（即涉外庭）庭长蔡晓玲、执行局二处处长（相当于庭长）李慧丽被采取强制措施。10月，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裴洪泉被中纪委“双规”。

李慧丽与裴洪泉曾经是夫妻，后来离婚，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被抓的经历都有些戏剧性。

今年，李与裴所生的女儿不幸患上红斑狼疮在北京住院，他们两人经常轮流去北京照顾女儿。一个拍卖行老板对李慧丽说：可以由拍卖行买单让她去青岛散

散。于是，李就同她母亲一道，到青岛“散心”，结果被逮捕。

裴洪泉是9月份被“双规”，当时快到午饭时间，他给另一副院长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这个副院长说正在某饭店。裴说：“我晚上没饭吃，就去你那吃吧。”结果，中纪委正在这个饭店等着他。

涉案法官曾主持多项改革

裴洪泉今年51岁，东北人，在深圳司法界被认为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

裴洪泉现在的学历是法学硕士，是“专家型法官”。裴在任时获得无数荣誉，曾被评为“人民满意好法官”。裴被“双规”后，他的副院长职务已经被免去，但大代表职务尚未免掉。

据了解，裴洪泉最大的成绩都产生在任罗湖法院院长期间。

首先是立案制度改革，针对立案难，罗湖法院承诺：凡材料齐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一小时内办好立案手续；其次是提高司法效率的改革。这些都曾为媒体争相报道。

裴洪泉还独创了一个名为“3122”的合议庭组合模式，在该机制下，各业务庭以3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组成固定合议庭，并在庭室内另设1名速裁法官，指导监督法官助理，实现速裁与调解职能。

裴洪泉被“双规”后，深圳有传言说，中纪委在他家查抄出现金2700多万元、美元95万元。

据透露，目前，深圳市中院已有20多名法官、8名律师被调查，另有几名律师“出国”，调查面在不断扩大，并涉及深圳基层法院法官。深圳中院的日常工作，由深圳市纪委代管。



深圳中院被抓的几名法官，其案发原因都有牵涉破产拍卖 资料图

■记者观察

令人忧虑的法官犯法

法官犯法已不鲜见，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被查处轰动全国。仅几个月前，就有武汉中院、阜阳中院的院长前“腐”后继而被采取法律措施。

“法官违法案近年来频出，并不代表法院系统是重灾区，事实上，它表明了中国法院系统不护短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反腐决心。”

一位人士认为，随着中国高层对反腐的重视，腐败份子将越来越无处藏身。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高度重视法院和法官的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肖扬院长上任以来，一直把“司法公正树形象”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最高法院已经出台了《有关法官违法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等各项制度和规章。仅2003年，就查处794个违法违纪法官。

11月1日，深圳福田区某公司股东徐海玲对记者说：“深圳这批法官被抓了我要放鞭炮庆祝。我以前有个案子，法官明确地对我说，官

司要赢，就必须得出钱给法官。打了一次官司后，我后来再也不敢去法院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卢海君近日到广东东莞为法官授课，他说，反观一些法治发达的国家，我们差距太大，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统计，没有一名法官犯案。

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也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司法腐败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必须下大决心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我们理当对西方汽车商“狠”点

□吕翔

据昨天的《广州日报》报道，哈佛大学能源技术创新项目主任凯丽·西蒙斯·盖勒格博士在美国智库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对西方的汽车商更“狠”一点，原因是，在中国投资的外国汽车企业很不情愿向中方转让其国外已强制实行的环保技术。一些外国厂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大致比国外要落后20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盖勒格博士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促进外国汽车技术转让方面缺乏一个连续能够严格执行的政策，也就是不够“狠”。

盖勒格博士的建议，颇值得

玩味。我们的确对外国汽车商太过宽容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没有哪个外国企业不垂涎。但是，我们却未能达到目的，甚至还得到了一个相反的结果。2003年，科技部调研室委托的一个课题研究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在合资陷阱中阻碍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开发道路的发展”，外商阻挠中国进行产品开发活动，掌握着引进新产品的主导权，不容许在合资企业中设立研发机构。

追根溯源就在于我们不够“狠”。外商喜欢遵循一种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你有这种规

则，它就遵守；你没有这种规则，它比我们自己都会钻空子。在我们让出市场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关技术转让的规则体系，没有强制外商转让技术，即使有，也常常存在相当大的弹性，似乎转让多少、如何转让全靠外商的自觉。按照盖勒格博士的说法，就是“政府在促进中国汽车技术转让方面缺乏一个连续并能够严格执行的政策”。

当时，一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在外商占领中国庞大市场的过程中，外商没有理由不转让技术。我们能够得到相应的技术，这显然是对外商的行为习惯缺少足够的了解。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常喜欢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便在执行的时候有更大的腾挪空间，这个弱点恰恰被外商利用了。盖勒格博士举了一个例子，在中国国务院制定新标准后，她询问了一位外国汽车商在华的高级管理人员：为什么他们宁可对旧式发动机进行改进，也不愿使用在欧美市场的更环保的新型发动机。对方回答：因为中国政府并不禁止，这样更加省钱。

对外商来说，只有刚性的标准和要求，只有没有回旋余地的规则，它们才会真正去严格遵守。比如，当中国政府颁布了汽车的欧II和欧III标准后，这些外国汽车商立刻就付诸实施，如果不强制，外国汽车商肯定还会故

意拖延。商人的本性是逐利，指望其以良心发现或道德自觉来回报你转卖市场付出的代价，只能是徒劳的。

其实，不仅在汽车领域，在许多领域都如此，我们用市场不仅没有换来技术，还换来了外商对中国技术研发的阻挠和限制，他们以此扼杀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更牢固地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导。因而，我们应该从更深远的视野去看待盖勒格博士的建议，及时总结教训，尽快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强制性的规则体系，促使西方企业对中国转让技术，同时，我们也应该强化自主研发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外商从技术层面对中国企业的扼杀和限制。

腐败是导致房价虚高的隐性力量

□姜素芬

据昨天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因严重违纪，收受贿赂，并干扰纪检监察部门办案，已涉嫌犯罪。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武龙的代表资格终止。王武龙涉嫌犯罪与房地产业有关。据报道，王武龙的弟弟王文龙担任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有市委书记的哥哥做靠山，王文龙得以顺利拿到南京市的一些竞争激烈的“黄金宝地”。

纵观近期来揪出的一些腐败案件，大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

仅今年6月，就有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与房地产有关的经济问题遭“双规”。

从六月到现在，又先后有多名官员因类似经济问题被双规，在官场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从这些案例中，既可以看出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之大，也可以看出部分官员与地产界的勾结之深。官员与开发商的勾结，主要是利益上的联系，即官员利用权力为开发商“行方便”，而开发商则报枕报季，给其经济上的回报。

这种权钱交换最终必然增大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假设没有腐败行为，与房地产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比如，土地的出让等等，都是市场化的，也是公开和透明的。政府采用公开招投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开发商们就能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土地。但是，当权力与开发商勾结以后，就凭空多出了三部分成本：

一是开发商与权力交换的成本。房地产行业与医疗药品行业、零售业并称为商业贿赂的三大高发领域。商业贿赂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据悉，开发商的“公关”成本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或更高，这对房价

起了推动作用。二是腐败竞争成本。开发商们为了更有把握拿到心仪的地块，可能争相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贿赂官员，加剧腐败的蔓延和升级。三是效率成本。当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和正常的权力行为，与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制约效率的发挥，这同样会大大增加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所以反对公布房价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扭曲房价中的隐性成本暴露出来。

相对而言，这依然只是表象的。一旦开发商与权力勾结在一起，这些开发商们就无惧相关政

新华社西柏坡旧址复原开放

75年前的“马背通讯社”已成全球大社

□据新华社电

作为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11月7日将迎来她75岁生日。按照“忠于历史、修旧如旧”原则复原的新华社西柏坡旧址已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炮声中。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简称“新华社”）。新中国成立

后，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担负起受权发布党和政府重要新闻的职能。

75年来，新华社已经由当初的“马背通讯社”“窑洞通讯社”发展为有相当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目前，新华社每天用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文、葡文、阿文、日文向全世界播发新闻和信息。新华网已成为在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参考消息》《瞭望》《半月谈》等都是具有影响力的重点主流媒体。

连发矿难 甘肃煤炭吃紧

安监总局副局长王显政提出4点要求

□综合新华社电

近日，甘肃省省内连发矿难，影响到煤炭的供应。

连日来，甘肃接连发生煤矿安全事故；10月31日，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1月1日兰州市红古区德顺煤矿矿区发生山体滑坡，德顺煤矿井口被堵；11月2日兰州市红古区福山煤矿，5名矿工中毒窒息死亡。

事故的发生影响到甘肃省包括兰州、白银等中部主要城市的

电厂和一些大型企业用煤紧张。针对甘肃连发矿难，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王显政6日表示，10月份以来，煤矿重大事故发生频率正加快。王显政提出4点要求，各地要把煤矿整顿关闭攻坚战引向深入，应予关闭的矿井名单本月内在当地主要报纸上公告；防止列为关闭对象的矿井突击生产，规范煤炭资源整合；坚决纠正基建和改扩建煤矿边施工、边采煤；严格煤矿生产能力复核结果的审查把关，加强重点煤矿安全基础管理。

天津：118个千万美元外资项目落户

□本报记者 李雁争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宣布，今年1至9月份，该区吸引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达118个，其中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3家，包括13家财富500强企业。

统计显示，前三季度，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总额、合同外资和实际到位分别达到39.36亿美元、25.56亿美元和11.3亿美元。

四川：36人办“官煤”被查处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最近的一项统计表明，四川186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撤出他们在煤矿中的投资。在违规投资煤矿的典型案件中，有36人被查处，涉及投资907万元，其中11人被移送司法机

关、541万元非法所得被收缴。调查表明，很多煤矿的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与“官煤勾结”有直接关系。煤老板通过接纳官员入股分红，与其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靠着权力保护伞逃避国家法律的监管约束，这实质上是典型的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行为。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核心原来是教育

□王平

“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农村运动’。”这是韩国新农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在谈新农村运动经验时的开场白。而在此之前，许多地方花费组织官员到韩国“取经”。东北某省会城市组织120名村支书去韩国考察，花了100多万元，都由市财政全额承担，结果“啥也学不到”。

李寿成给我们答案，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真正核心是从外表看不出来的，其核心就是重视教育。据《人民日报》报道，韩国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新农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农民树立“做就成”的信念，激发农民生精神，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推动农业人口的转移，实现农村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承担了相当多的责任。一是大学教育。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二是基层培训。韩国注重对基层新农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通过系统培训，农民的责任心、牺牲精神和实际能力都明显增强。

当然，与建设豪华住宅相比，在农村普及教育的难度更大，效果也不容易显现出来。在一些干部仍被急功近利思维左右的时候，教育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引起官员们的重视。而且，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层出不穷的今天，官员们能否愿意往教育上面投资，也是一个未知数。因而，普及农村教育，应该是自上而下的，通过硬性规定和严格考核，来促使官员们重视这一问题，不然，教育本身也可能流于形式。

韩国的新村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心目中，新农村就是崭新的住房、就是宽马路，因而，一些地方甚至举债强迫农民盖豪华住宅。比如，福建漳州市西坑村“家家别墅、人人盖新楼”，但是由于举债修建别墅的村民无力归还贷